



从巴赫金到哈贝马斯

——20世纪西方话语理论研究

From Mikhail Bakhtin to Jürgen Habermas

A Study of The Western Discourse Theory in the 20th Century

刘 晗 ● 著



西南大学出版社



从巴赫金到哈贝马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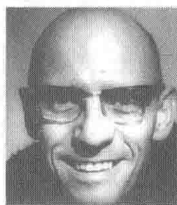
——20世纪西方话语理论研究



From Mikhail Bakhtin to Jürgen Habermas

A Study of The Western Discourse Theory in the 20th Century

刘 晗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从巴赫金到哈贝马斯: 20 世纪西方话语理论研究 /
刘晗著.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643-5209-7

I. ①从… II. ①刘… III. ①思想家—思想评论—研究—西方国家—20 世纪 IV. ①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7465 号

从巴赫金到哈贝马斯
——20 世纪西方话语理论研究

刘 晗 著

责任编辑 郭发仔
封面设计 何东琳设计工作室

印张 15.25 字数 274 千

成品尺寸 170 mm × 230 mm

版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

印刷 四川煤田地质制图印刷厂

书号 ISBN 978-7-5643-5209-7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网址 <http://www.xnjdcbs.com>

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西南交通大学创新大厦 21 楼

邮政编码 610031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定价 5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序

刘晗的博士论文《从巴赫金到哈贝马斯——20 世纪西方话语理论研究》即将正式出版。他嘱我写个序，作为他的导师，我欣然同意了。说实话，学生有著述出版，特别是初出茅庐进入学界的博士，其博士论文能在坊间刊行，对于导师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和回报！

刘晗的博士论文的焦点是话语理论，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很难研究的课题。在当代国内外学界，“话语”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在哲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学、美学、文化研究等诸多领域汗牛充栋的研究文献中，“话语”是一个出现频率极高且语义极为复杂的术语。由此可以想见，对话语问题史展开研究是一项多么艰难且需要学术勇气的工作。刘晗在博士学习期间，阅读了大量中外文献，对这一问题作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思考。在廓清话语理论在 20 世纪的发展流变脉络的基础上，他着重讨论了从巴赫金到哈贝马斯的历史发展情况，揭示了在“语言学转向”趋势中的“话语转向”。

在这本著作中，刘晗很巧妙地选择了 20 世纪西方话语理论中基于不同文化传统和思想背景下产生于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的四个代表性理论范式。它们像四个乐章，共同构成了这个世纪的“话语交响曲”，从不同侧面、不同层面、不同声部演绎了话语理论极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和令人着迷的思想魅力。

巴赫金的话语理论是从其超语言学观念上发展出来的，又在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研究中具体化，如果将这一理论置于其形成的特殊语境，我以为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针对性，那就是对苏联斯大林的专制主义的尖锐批判。言语行为理论出现并流行于英美，强调的是对语言行为及其意义的解释，后来也发展成为一种很有特色的文学理论，但是相较于巴赫金的话语理论，言语行为理论似乎更加偏重于从技术层面对语言行为进行分析。第三个代表性理论是福柯的话语理论，它是“法国理论”最重要的派别，也是对诸多领域产生极大影响的理论。对福柯来说，“话语形成”的过程就是权力和知识共生的运作过程，其间所伴随的各种以“求真意志”为导向的规训，最终塑造了人们根深蒂固的“认知型”，导致权力对主体的宰制以及在主体中的再生产。

最后一个是哈贝马斯的话语理论，与前三者有所不同，哈贝马斯更强调交互主体性及其交往理性，强调差异性对话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这四种理论虽然形态各异，但都触及话语理论一些根本问题、主体间的对话性及其意义的理解，当然还或隐或显地触及人与社会、主体与权力的复杂关系。

在我看来，话语理论在 20 世纪被西方学界高度关注，并发展出形形色色的不同理论，我们有理由把话语理论看作最有生产性的思想资源。在中国晚近，话语理论也受到了学界的关注，话语理论的诸多方法和范畴，也被广泛用于对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问题的分析，尤其是在文学艺术、大众传媒领域等。刘晗的这本著作不但分析了这四种代表性的话语理论，而且在比较参照中对它们做出了公允的评价，进而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看法。这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从文艺学和哲学角度进行话语理论研究的专著。这本书的出版，我想，会对国内话语理论研究产生一些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话语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语言实践系统，对它的讨论也从来就是开放的、未完成的。刘晗的这个专题讨论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路线图，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关于话语理论的研究成果问世。这大概也是刘晗这一专题研究的价值所在。

现在，刘晗身处祖国西南的吉首大学，已经从事学校的行政工作不少年头。工作之余，他继续自己的科研工作，这对青年学者来说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情。当下的中国大学高度行政化和科层化，学术生态极其糟糕，这对青年学者会产生种种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压力，那种纯粹出于个人兴趣的自由探索式的研究已经变得越来越少，这与我成长的 20 世纪 80 年代的学术生态截然不同。从当下现状来考虑，刘晗虽然一方面从事学校的行政工作，另一方面却念念不忘自己的学者角色，这是难能可贵的，这本书的出版就是一个明证。我真心希望刘晗能继续坚守自己的学术研究，将来能有更多的研究成果不断面世。

是为序。

周 宪

2016 年 9 月 30 日

于南京大学



目 录

引 言 从语言到话语 001

一、语言范式的建构与确立 002

二、语言学的话语转向 007

三、语言与话语的比较 012

四、研究思路、问题与框架 019

第一章 话语的对话性：巴赫金的话语理论 029

第一节 批判与反思中的超语言学建构 030

一、对个人主观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031

二、对抽象客观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036

三、超语言学建构与意义观转型 042

第二节 话语的对话性与诗学问题 052

一、话语内在对话性呈现的两个层面 053

二、话语外在对话性与文学体裁问题 059

三、人文科学话语的对话性 068

第二章 话语与行为：奥斯汀的话语理论 077

第一节 话语行为理论的思想渊源 079

一、作为行为的话语 079

二、回归日常交流的话语 082

三、话语行为的规范性 087

第二节 话语行为理论的问题聚焦 090

一、记述话语与施行话语 091

二、表意、施事与取效 095

三、话语行为、语力与意义 099

第三节 话语行为理论的批判发展 107

一、间接话语行为与意向性 108

二、严肃话语与虚假话语 111

三、文学话语及其建构性 114

第三章 话语与权力：福柯的话语理论 120

第一节 话语与权力的内在联结 121

一、从认识型到档案 122

二、话语的位置设定 130

三、作为话语基本单位的陈述 135

四、话语与主体建构 141

第二节 话语形成中的控制与反控制 148

一、话语的外部控制 149

二、话语的内部控制 155

三、话语使用条件的控制 159

四、话语控制中的反控制 161

第四章 话语与共识：哈贝马斯的话语理论 169

第一节 话语交往的普遍语用学设定 170

一、从语言资质到交往资质 170

二、话语的普遍语用学规范 175

三、话语交往的商谈伦理 180

第二节 话语交往的乌托邦想象 184

一、工具理性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185

二、语用学预设与理想的言谈情境 189

三、文化社会学塑形与公共领域 193

结 语 走向开放的话语理论 201

参考文献 208

一、著作部分 208

二、论文部分 217

人名索引 222

主题索引 225

后 记 231

引言 从语言到话语

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西方理论的发展，我们一般将其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阶段，即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与语言论阶段。西方理论的这种发展路径其实远古希腊时期的智者高尔吉尔就曾以反向的、否定式的言论进行了预见，他曾经一连提出了三个且战且退的命题：“第一，无物存在；第二，如果有物存在，人也无法认识它；第三，即使可以认识它，也无法把它告诉别人。”^①高尔吉尔的这三个命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蕴含了西方理论发展进程中理论家在理论建构中研究对象、问题意识、思考视角与目标任务的一种历史变迁，准确地预见了西方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历史轨迹。结合西方理论发展史的实际，我们不难发现，高尔吉尔的这三个反向的具有逻辑关联性的命题正好与西方理论，诸如哲学、美学与文学理论的自身发展史的发展阶段一一对应。与其不同的是，西方哲学、美学与文学理论不是以一种否定的方式来逐次展开这三个命题，而是锲而不舍地以肯定的态度来论证这三个命题，进而形成了各自理论发展的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和语言论阶段。

历史地看，随着人类认识外在世界、理解内在世界的逐步深入，尤其是现代以降，各种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不断推陈出新，此前不曾被关注或者关注不多的众多问题越来越清晰地进入西方理论建构的视野，甚至成为理论言说的核心问题，诸如语言问题，不断推动西方理论问题意识的与时俱进和存在形态的历史变革。20世纪可以说是一个语言论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一个最为重要的显著特征就是，西方理论，不管是宏观理论还是微观理论，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于语言。它们要么从语言学里寻找本学科理论发展与思想创新的方法论，要么就将本学科的理论问题与语言关联起来，试图创新本学科的理论问题，拓展本学科的言说边界，推动本学科向前发展。这一点，在西方的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在其主编的《哲学主要趋向》（*Main Trends in Philosophy*，初版于1978年）中就十分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不无深刻地指出：“如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6-57页。

果我们企图涉及一切表明过去五六十年间哲学家对语言发生兴趣的研究，就不得不涉及我们时代的几乎全部哲学成果。因为这种对语言的兴趣，是今日哲学最主要的特征之一。”^①

但是，20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理论对语言的重视与传统哲学、美学、文学理论不一样的是，语言已经不再仅仅是人类操持的一种简单的表达工具和交流媒介，而是理论反思自身问题视域与存在合法性的一个逻辑起点。语言在某种意义上说，更具有一种“先验性存在”的特征，人类对世界、自我与他者的理解都是在语言中进行的，脱离了语言，人类既不能思维，也无法表现，更不能理解，沟通与交往就成了重大的问题。20世纪以来，西方理论界对语言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此，语言不再是一种透明的、无立场、中性的存在物，而具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建构性和意识形态性，人类所思所想的限度都由语言来决定。更进一步说，一种语言就是一种存在方式，一种语言就是一种文化观念，一种语言就是一种自我建构，甚至一种语言就是一套价值观念。正是在此意义上，20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美学与文学理论纷纷将自己这个学科的基本问题同语言联系起来进行思考、讨论，首当其冲地分析语言对于本学科问题展开的可能性和局限性，把对语言的反思作为本学科进一步讨论的逻辑起点，强调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对本学科的经典问题甚至已经成为常识的思想与观念进行清理。一般而言，人们把这种20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理论等人文社会科学聚焦于语言，以语言为起点，通过谈论合适的语言的方式来谈论世界和相应的理论问题的学术研究范式转换，称为“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②

一、语言范式的建构与确立

在20世纪西方理论的发展中，我们发现，语言这个概念如前所述具有十分复杂而又多维的意义。一方面，语言可以说是人类用于交往的一种具体方式手段和媒介形态，是语言学研究要关注的具体对象；另一方面，语言更是一个隐喻，象征着人类理解世界、认识自我、关照他者的一套观念体系；再一方面，语言还是一种思维方式和操作路径，影响或制约我们对事物的分析

① [法]保罗·利科：《哲学主要趋向》，李幼蒸、徐奕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37页。

② “语言学转向”最早由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古斯塔夫·伯格曼在《逻辑与实在》(Logic and Reality)(1964)一书中提出，但这个说法被广泛流传和使用，则主要基于理查德·罗蒂所编1967年出版的《语言学转向——哲学方法论文集》(The Linguistic Turn: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

与看法。从后两者的内涵与表征看来,在 20 世纪,语言已经逐步上升为一种独特的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mual Kuhn)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新范式(Paradigm),开创了理论研究的新思维、新思路和新方法,影响认同这一范式的理论家在理论建构中究竟说什么、怎么说、为什么说等理论建构与思想言说的方法论与实践路径的选择,规约着西方理论的关照视域、目标任务与价值取向,形成了不同于同时代的学术观念体系,推动了西方理论的发展和学术思想的创新,引起了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学术领域的思想家和研究者的高度关注。

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在 20 世纪西方理论的语言学转向中,特别是语言范式的建构中,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语言学理论和语言学思想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具有奠基性的意义。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之父。他在批判比较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基础上,聚焦于语言交流何以可能这个此前语言学不曾关注或者涉猎不深的元语言学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语言学理论,开辟了语言学研究的新路径,提出了一整套不同于传统语言学的语言学概念、范畴、命题与体系。在《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中,索绪尔将语言与言语作了区分。在索绪尔看来,语言(Langue)“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一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①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是一种使言语获得理解的准则与规范,言语只有置于语言系统中才能获得意义,才能成为交流、沟通和表达的方式和手段。语言在一定的社会中形成,“它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个人以外的东西;个人独自不能创造语言,也不能改变语言;它只凭社会的成员间通过的一种契约而存在”^②。它规约了言语表达的有效性和可能性。语言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通过言语实践存放在某一社会集团全体成员的宝库,一个潜存在每一个人的脑子里,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潜存在一群人的脑子里的语法体系”^③。一般而言,生活于该社会中的人只有掌握了语言这套规则体系,才能够进行正确的遣词造句。只有遵循这套规则体系,才能够用口头的或者书面的言语进行可能的意义表达和思想交流。

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与语言概念相对的是言语(Parole)。言语作为遵循规则体系的语言使用,是一种具体的语言活动,具有个体性、具体性、直观性和现象性,而且“整个来看,言语活动是多方面的、性质复杂的,同

① [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30 页。

② [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36 页。

③ [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35 页。

时跨着物理、生理和心理几个领域”^①。言语一般都复杂易变，稍纵即逝，很难把握。但不管言语如何千变万化，它都必须被纳入一定的语言规则系统中才能获得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语言是潜藏在言语下面的规则系统，言语则受规则系统的制约与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言语是语言的表层显现。索绪尔主张语言学的任务和使命是在对这些纷繁复杂的言语现象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揭示那些隐藏在言语背后的系统与规则，而不是拘泥于这些乱花迷眼的言语现象从而迷失了方向。在索绪尔的理论视域中，语言是稳定的，言语是多变的；语言是社会性的、言语则是个人性的；语言是本质的，而言语则是现象的。根据本质决定现象的思维模式，语言则决定着言语。索绪尔在批判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基础上，对语言和言语概念的全新理解和深刻阐释启动了西方理论的一场历史性革命，直接推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几乎涵盖所有学科领域的理论变革浪潮的到来。

语言范式的建构建立在索绪尔对语言概念的重新理解与阐释上。在索绪尔的理论体系中，语言概念是一个共时性的概念，它超越了个体、历史、文化与生活，是对具体言语进行抽象的结果。由于索绪尔主张对语言进行一种共时性分析，所以他只研究一个社会中各种符号如何组合才能表达意义，才能成为一个可理解的句子的潜在规则，如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组合与聚合的关系等。在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中，语言相较言语具有优先性，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地位，揭示言语背后起作用的这种语言规则体系，就成了语言研究的旨归。相较于言语的多样性、多变形和灵动性，语言则是一套板着面孔、没有亲和力、僵硬但又无时无刻都无法脱离的在场的规则体系。保罗·利科在分析索绪尔的语言范式时也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深刻地指出：

他从语言中删除了声学的和心理学的“内容实体”，使其只限于是“形式”，即在诸单元间的纯区分性的、对比性的关系，不论这些单元是因素还是词汇的意义。为了理解这些单元的系统的相互依赖性和统一性（它们构成了语言），他把同时性语言学（这种语言学研究在任何时间进入系统的诸单元）从历史性语言学（它研究从系统的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的变化）中分离出来。^②

正是从这个层面上，索绪尔的语言被视为一个无主体、无历史、无内容的形式存在物，是一个稳定的结构系统，在方法论上体现了“由实体论的思

① [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0页。

② [法]保罗·利科：《哲学主要趋向》，李幼蒸、徐奕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38页。

想方法向强调关系的思想方法的过渡”^①。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所指的语言跟外部世界没有关联，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外部世界的变化也不能影响这个语言系统本身。“语言这个概念被当作一个去语境的抽象的符号系统来看待，在这个系统里任何成分的意义仅来源于它相对于其他成分的位置”^②，语言系统中的各种因素与符号能表征的意义取决于相互之间的位置变化以及相互之间的差异性。因此，索绪尔的语言概念是一个闭合的、完全自律的范畴，它只受制于自身系统中相关因素的变化与调整的影响，而与系统之外的其他因素没有关系。这个语言结构系统似乎很难具体化，看不见、摸不着，但在人类的表达、交流、沟通中又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决定着语言交流的成功与失败。

索绪尔所开创的语言范式以及着重于语言结构、符号系统和形式关系分析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在 20 世纪学术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有关语言占统治地位的观点都是通过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形成的。”^③而且在今天，我们将语言作为一个结构系统来理解也无不是在索绪尔的传统下进行的。因为“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建立的语言结构观对现今的语言学仍起着主要的支配作用”^④。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正是在这种认识上，索绪尔要建立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并将之称为符号学，“它将告诉我们符号是由什么构成的，受什么规律支配”^⑤。沿着索绪尔的学术思想与研究路径，在索绪尔去世之后，其追随者进行了阐释和传播，其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得到了很多语言学家的响应，在语言学或者语言哲学内部形成了一股强化语言结构研究的学术思潮。从语言学内部来看，在 20 世纪 30~50 年代，按照索绪尔语言范式的研究思维与方法形成了致力于音位系统研究，以马泰修斯、雅各布逊、特鲁别茨柯伊、哈弗阿奈克为中心的布拉格学派；形成了聚焦于语言形式，尤其强调语言的组合关系，以叶尔姆斯列夫、布龙达尔、乌尔达尔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形成了注重于口语和共时描写，强调形式分析与描写技术构建，以布龙菲尔德、鲍厄斯、萨丕尔为核心的美国描写学派。他们虽然对话

①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钱俊汝、李自修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 页。

② Janet Maybin. “Language, Struggle and Voice: The Bakhtin/Volosinov Writings”. In Margaret Wetherell, Stephanie Taylor and Simeon Yates (eds.),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A Reader*, London: The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64.

③ Janet Maybin. “Language, Struggle and Voice: The Bakhtin/Volosinov Writings”. In Margaret Wetherell, Stephanie Taylor and Simeon Yates (eds.),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A Reader*, London: The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64.

④ [法]保罗·利科：《哲学主要趋向》，李幼蒸、徐奕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第 338 页。

⑤ [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38 页。

言学研究的视角和重点均有差异，但他们都是受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表达的语言学思想的影响和启迪，应用和发展了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强化和凸显了索绪尔构建的语言范式。

历史地看，语言范式是索绪尔以及后来的结构语言学基于语言研究而建立的。换句话说，这种特殊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来源于语言学研究。但在20世纪西方理论发展历程中，这种独特的研究视野、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很快溢出了语言学的边界，被其他众多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竞相吸收，成为相应学科调整自身研究思路、改变陈旧研究方法、拓展学科研究边界的重要方式与手段。诸如，法国人类学列维·斯特劳斯在其《语言学的结构分析与人类学》中就运用索绪尔在语言学研究中提出的结构分析方法来研究人类学问题，将人类的各种文化现象视为深层结构体系的表现；罗兰·巴特在《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Système de la Mode*, 1967）中就是从一种深层的社会文化结构来分析当时的流行服装以及相应的表意实践的；俄罗斯民间文艺家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也试图从结构的角度来分析纷繁复杂的俄罗斯民间故事，从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民间故事中抽离出故事的结构要素和结构模式及其深层的组合规律等。索绪尔对语言概念的这种理解和阐释，奠定了学界对语言范式独特内涵的理解，随着它被征用范围的进一步扩展而日益丰富。索绪尔开创的这种独特的语言范式，概括起来说就是一种对语言学、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用一种抽象的结构系统分析和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分析来讨论相应学科领域的理论问题，带有显著的形式分析特征。诸如，对于何谓文学问题不是从文学作品的内容特征、主题思想和价值观念来讨论，而是从文学语言的形式特征来讨论，来追问文学之所以可能的内在原因。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所构建的语言范式以及阐发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论模型在20世纪以来的西方理论发展中影响越来越大，并超越了语言学科成为一种普适的形而上的学术思维和学术方法论。从20世纪西方理论发展的理论格局来看，西方现代哲学、美学、文学理论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借用表现得最为积极，扮演了推动语言范式普适化的急先锋，使语言范式迅速蔓延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的绝大部分领域。语言范式的结构分析与形式导向革新了西方理论的思维方式，拓展了西方理论的问题域，形成一股强大的用语言学思维与方法解决相应学科问题的思想潮流。具体到美学和文学理论领域，这种语言研究范式的集中应用应该说始于俄国形式主义。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形式主义运动中，俄国形式主义以文学性为焦点问题，要求文学分析应该与历史分析与心理分析划清界限，认为文学的语言结构形式特征的独特性是文学区别于其他语言形式的根本原因。循此思路，后来的捷克

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以及符号学、叙事学等众多的西方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流派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索绪尔开创的语言范式的启发和影响,并不断拓展语言范式的应用领域,丰富和发展语言范式的具体内涵,使20世纪的众多理论言说都打上了深深的语言学烙印,确立了一种从结构、形式或者系统的角度来研究学术问题的学术研究范式。

总之,索绪尔的语言是一种抽象的、非实体性的语言。语言范式是一种脱离说话主体,抛弃语言情景,对研究对象作抽象的、静止的结构分析与形式分析的学术研究模式。索绪尔的语言范式具有形式主义和抽象逻辑主义的特征,这种范式远离了实际的语言使用和语言交流,对语言的主体进行了驱逐,在一种闭合的体系里进行结构和要素分析,对现实生活中的语言现象进行了一种纯粹化的处理和过滤。语言范式的建构与确立,使20世纪的西方理论研究思路更为清晰,路径更为明确,方法更具操作性,目标更为具体。但这种做法直接导致复杂问题的简单化处置,使复杂问题的众多层面被人为地遮蔽,使20世纪西方理论发展过程中的众多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关照。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以及建构的语言范式迅速扩展直接导致20世纪西方理论建构的去主体化、去历史化,走向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在索绪尔的语言观的影响下,20世纪西方理论中人文科学类的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研究在语言学转向中,以科学主义为旗号,走向了一种静止的、封闭的、深层的文本结构分析。在文学艺术研究方面,对文本的分析变成了一门放弃现实功能和价值评价的技术分析学。在这一大的范式内,这种建基于索绪尔语言学的结构分析或者文本分析成为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理论等语言范式学术研究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和理论取向。

二、语言学的话语转向

根据研究侧重点的不同以及研究任务和研究使命的差异,美国语言哲学家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William Morris)1938年在《符号理论基础》(*Foundation of the Theory of Signs*)一书中以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的语言符号学为基础,认为符号学是一个大的学科,其实在这个学科里面还可以进行相应的部门分支学科的划分。莫里斯认为,符号学可以分成三大部分,分别为语用学(Pragmatics)、语义学(Semantics)和语形学(Syntactics)。

1946年,莫里斯在《指号、语言和行为》(*Signs, Language and Behavior*, 1946)中更为具体地指出:“语用学研究‘指号(Sign)^①和解释者之间的关系’,语义学研究‘指号 and 其所指示的对象之间的关系’,而语形学研究‘指号相互间的形式关系’。”^②如果按照莫里斯的划分来反观索绪尔的语言范式和语言学研究,我们不难发现,由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抛弃了具体的言语现象,在索绪尔的语言学里仅仅包含语义学和语形学(或者说语法学)。这一点,法国语言学家艾迪·卢莱(E. Rouelt)也清醒地看到了,并对索绪尔的这种做法进行了分析和批评。他认为,索绪尔所提出的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引起的结果是关于语言系统的研究迅速发展起来了,可是同时也产生了不幸的后果,引导语言学家脱离了对语言运用的研究”^③。也就是说,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把语言的实际使用,把语言符号和它的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在其研究视域中忽略或者遗忘了。本书所关心的20世纪西方话语理论正是从索绪尔忽略或者遗忘的地方开始,通过艰难的理论探索,构建了自身独特的问题视域、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任务目标,形成了不同于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话语理论诸多形态,推动了西方理论的发展变革与范式转换。

历史地看,西方理论的话语转向其实在索绪尔建构强大的语言范式的同时就已经开启。苏联N. C. 巴尔胡达罗夫教授曾经敏锐地指出:“现代语言学总的发展趋势是从研究语言的抽象体系转向研究语言在言语中的功能。”^④只不过这种声音一开始十分微弱,在语言范式如日中天的时候,很难引起理论界的关注和重视。通过对学术史的梳理,我们发现,其实早在1926年,捷克语言学家威廉·马泰休斯(Vilem Mathesius)创立的布拉格学派就主张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研究和考察语言,强调研究语言应该要与人们语言交际的具体环境联系起来,同语言使用的社会文化联系起来,并尝试摆脱对语言的形式—逻辑分析。威廉·马泰休斯提出要将句子的实际切分与形式切分区别开来,其实际切分就是在语言使用中对句子的划分,而形式切分则是语法学的,因此威廉·马泰休斯的语言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基于语用层面上的话语研究。20世纪30年代,英国语言学家J. R. 弗斯(John Rupert Firth, 1896—1960)创立的伦敦学派与索绪尔不一样的是,强调必须在情景中研究和理解语言。他认为:“人们的话语不能脱离他在其中起作用的那个社会复合体,现

① “Sign”这个单词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将其翻译成“符号”,《指号、语言和行为》的译者罗兰·周易将“Sign”译成了“指号”。

② [美]莫里斯:《指号、语言和行为》,罗兰、周易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1页。

③ [法]艾迪·卢莱:《语言理论、语言描写和语言教学》,胡明扬译,《语言学动态》,1978(3):15。

④ 王福祥:《话语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王福祥、白春仁主编:《话语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代语言的每一段话都应该有其发言的背景，都应该与某种一般化的情境上下文中的典型参与者联系起来加以研究。”^①在一定的意义上，语言只有在情景中才具有意义，因此他提出了有必要划分语言的形式意义和情境意义，而情景意义的提出显然是对索绪尔的突破。在俄罗斯，话语范式的建构主要是从研究话语的超句结构开始的，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提出的“超语言学”概念、语言学家布拉霍夫斯基提出的“超句统一体”概念、波斯别洛夫提出的“复合句法整体”概念都是这一转向中的具体表征。尤为重要的是，在1948年，波斯别洛夫的《复杂的句法整体及其主要结构特征》、菲古洛夫斯基的《从单句法到话语句法》这两篇重要的论文的发表，其从不同层面提出从整体研究语言的必要性，并要求将交流中的语言视为一种复杂的整体，强调语言与表述人之间的关系等，奠定了语言学话语转向的重要理论基础。1966年，深受索绪尔影响的法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埃米尔·本维尼斯特出版了《普通语言学问题》（*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1966）一书。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自己对语言的理解，认为话语就是行动中或者使用中的语言，而且他在对语言学理论的阐述中，将索绪尔构建的语言范式中排除出去的主体，在语言的使用中吸收了进来，使主体回到了语言研究的视野，使主体问题得到了应有的关照和重视。有学者指出：“本氏（指本维尼斯特——引者注）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最大的不同正在于把‘人’（主体）引入冰冷枯燥的语言，让人性的光芒与温暖持久地滋润语言。但是，本维尼斯特所研究的对象并不是某个具体的人或者某个具体的语言行为，而是‘人在语言中’的整体境况。”^②以话语为核心命题对于主体的强调，表明本维尼斯特对于语言学的研究，已经从索绪尔抽象的语言体系的研究转向了使用中的语言的研究，即话语研究，同时也开启了一种不同于索绪尔分析语言的方法与范式。

其后，对语境、超句子、主体、功能给予相应的重视的语言学研究倾向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语言学、语言哲学家的重视、理解和支持，慢慢地汇聚成一股强大的不同于索绪尔语言范式的语言哲学思潮。这种愈发明晰的研究倾向直接推动了1968年在德国康斯坦茨举办的话语语言学专题讨论会的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哈特曼（P. Hartmna）发表了《话语作为语言学对象》一文，明确了这种不同于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话语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原则、目标与任务，逐步实现了语言学的话语转向。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语

① J. R. Friht (1957). "A synopsis of linguistic theory 1930-1955". *Studies in Linguistic Analysis Oxford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41 (4): 12.

② 朱江月：《“人在语言中”：本维尼斯特对语言与社会关系的阐述》，《当代修辞学》，2014（4）：62。